

第三卷·第一期(总第五期)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汪丁丁 主编



2006年首届中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特稿

易君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基于工作搜寻理论的一个实证研究

刘曙光 宋德勇：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创新——路径转型问题探讨及产业集群案例

罗纳德·科斯：为什么经济学将变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第一期（总第五期）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汪丁丁 主编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3卷. 第1/汪丁丁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768 - 4

I. 新... II. 汪... III. 政治经济学 - 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85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三卷·第一期

汪丁丁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768 - 4/F · 1541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2006 年首届中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特稿

为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首届“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引言 ◆ 汪丁丁 · 1

会议信息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 · 6

论文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基于工作搜寻理论的一个实证研究 ◆ 易君健 · 8

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创新——路径转型问题探讨及产业集群案例 ◆ 刘曙光 宋德勇 · 26

“教育致贫”研究 ◆ 谷宏伟 郝媛媛 · 45

逆向选择、信息传递和中国 IPO 折价 ◆ 汪淼军 黄玉启 · 65

知识、有限理性及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含义 ◆ 周德翼 曹士龙 · 84

学术动态

为什么经济学将变革? ◆ 罗纳德·科斯 李华芳译 · 104

书评

被遗忘的贡献: 默雷·罗斯巴德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 彼得·鲍塔克 克瑞斯托弗·科尼 李陈华译 · 110

稿约 · 129

CONTENTS

Special Article: The First “New Political Economy Forum” in China Unfolded

Why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Introduction on the First “New Political Economy Forum” ◆ *Wang Dingding* · 1

Conference Information ◆ *Editorial Board of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 6

Papers

Rural-to-Urban Mobility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 *Yi Junjian* · 8

From Path Dependence to Path Creation: Discussion on Path Transi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Qingdao Home Appliance Cluster ◆ *Liu Shu-guang Song De-yong* · 26

Does Education Causes Poverty? ◆ *Gu Hongwei Hao Yuanyuan* · 45

Adverse Selection, Signaling Theories and IPO Underpricing in China

◆ *Wang Miaojun Huang Yuqi* · 65

Knowledge,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 *Zhou-Deyi Cao-Shilong* · 84

Academic Perspective

Why Economics Will Change? ◆ *R. H. Coase Translated by Li Huafang* · 104

Book Review

The Forgotten Contribution: Murray Rothbard on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 *Peter J. Boettke Christopher J. Coyne Translated by Li Chenhua* · 110

2006 年首届中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特稿

为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首届“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引言

◎ 汪丁丁*

我们今天举行的，叫做“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在我们的会议开始之前，作为“引言”，我希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老政治经济学？回答这一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涉及我们这次学术会议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每一个人都具有社会性，故每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大致分类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后者又称为“集体行动”。那么，什么是人类的集体行动的目的呢？按照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的论述，决定了人类行为和世界历史的两种最持久和最基本的力量，其一是经济的，其二是宗教的。

如果一门学科从行动者关于行动的“意义”这一角度来研究集体行动，则它应归入“社会学”范畴，即韦伯和齐美尔各自界定的广义的社会学。此外，从任何其他角度来研究人类的集体行动的学科，都应归入“政治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界定的广义的政治学。

可是，我们关注的是“新政治经济学”。首先，这一概念是来自下列两方面的论题的合题，其一是政治学论题，其二是经济学论题。其次，它还构成一个思想史的论题，那就是在“新的”与“旧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给出恰当的区分，从而能够赋予新政治经济学以学术合法性。

在政治学思想史上，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以前的政治学可称为“古典政治学”，也就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马基雅维利结束的那种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是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加以分类，把它们概括为不同的政体，并考察每一政体的宪法——也可称为“政治生活的构成原理”。

马基雅维利以后，大约到1923年莫斯卡发表《政治科学要义》第2版，这段时期可称为“新政治学”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体系。按照莫斯卡的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政

*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该文为作者在首届“新政治经济学论坛”上的发言。文章根据发言提纲及一份旁听者笔记整理。

治学中考察的那些政体——“独裁的”、“贵族的”、“民主的”、“寡头的”，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各种倾向，而现代社会的任一政体，可视为这些倾向的综合，从而不再有单一类型的古典政体。这是很重要的看法，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政体是各种倾向之间博弈的结果。把“集体行动”看成各种倾向的综合，这就是新政治学的看法，它把“宪法”视为由各种倾向综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活构成原理。换句话说，一套宪政，不论它事先被定义为是“民主的”还是被定义为是“共和的”，由于各种政治倾向的斗争和演化，它可能蜕变为“寡头的”，也可能仍保持原来的类型并继续演化。一旦出现了寡头政体，根据莫斯卡的看法，演化将很难摆脱“维持寡头统治”或“爆发革命”这两种形态，革命的目的在于使演化从既有路径跃迁到新的路径上去。

莫斯卡之后，顺便提及，我认为，与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同时兴起的，是由施特劳斯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政治学。当然，这一看法似乎并未表达在政治学教科书里。

让我们转向经济学思想史。首先是古典经济学，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财富”及其积累过程。换句话说，从“幸福”概念出发，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试图将“最高的善”视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构成原理的基本方向时，古典经济学家，例如斯密，也从“幸福”概念出发（《道德情操论》），试图将国民财富的生产及分配原则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国富论》）。古典经济学大约在1870年代随着经济学“边际革命”而终结，随后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阶段，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至萨缪尔逊（《经济分析基础》）大致完成。自1950年代开始，阿罗和布坎南开始发展他们各自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

现在我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旨在说明这样一种看法：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是围绕着个体理性选择模型展开的，但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却不是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的结果。也就是说，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按照其内在逻辑在政治学领域内展开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应当在知识社会学视角下考察新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演变。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此处不论。

现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的。阿罗和布坎南的思路有一些共同的前提：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第二，“以价值取代口味”，然后引入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

以价值取代口味，这可能成为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借用弗里德曼的看法，提出要把“value”（价值）和“taste”（口味）区别开来。后者是每一个人对各种私人事件的评价或排序，前者是每一个人对各种公共事件的评价或排序。将价值与口味分开，也反映在布坎南的理论中。不过阿罗在规范理论方面更彻底一些，而布坎南在实

证理论方面更彻底一些。布坎南试图讨论价值的形成，他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形成追溯到最初的位置，或者说要把它还原为完全不知晓状态下的价值。这已经类似于罗尔斯的讨论了，布坎南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同样的结论，海萨尼的论证途径与此不同，他把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每一个人对一切可能生活的评价联系起来。也因此，布坎南不能回避伦理学论争。阿罗则可以回避伦理学论争，因为他只假设存在个人价值，并且他的定理允许个人价值在一切逻辑可能的范围内变动。他在博士论文开篇就声明他不打算卷入伦理学论争，也因此，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前提的论证，是不完备的。

此外，阿罗思路和布坎南思路都把集体行动视为对社会成员的个人选择的集结过程，当然，阿罗思路是规范理论的思路，布坎南思路是实证理论的思路。因此，布坎南为政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log-rolling”（互投赞成票）提供了基于“效率”原则的合法性论证。互投赞成票与贿选，政治学家通常认为是“腐败的”，是应予禁止的活动。按照布坎南的思路则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类活动必定有害，因为它可能提供使集体决策走出僵局的有效途径，它是政治的讨价还价方式之一。凡现实政治，总归是折中与让步，总归是寻求冲突各方达成妥协的途径。换句话说，布坎南思路的实质是“对话—交易”的思路。阿罗的思路是规范理论的，他只讨论社会选择的逻辑不可能的各种情形，至于现实世界里何种集结过程是更好的社会选择机制，阿罗把它留给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这样，在阿罗那里，集结过程就被表达为一套“社会选择算子”，它是政治家的政治活动的结果，政治家的活动是政治艺术的运用。阿罗相信，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不可能预先知道的。

逻辑表达无法穷尽通过政治艺术可能落实的全部结果。这一看法，我认为特别重要。也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我认为，阿罗的思路和布坎南的思路必须成为互补的，它们必须被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或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完整的出发点。

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任何一套理论，只要被称为“理论的”，其形态就必定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原本的。柏拉图学园的门口为什么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请勿入内”？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内，启蒙时代以来，涌现出一些对西方思想传统做了大范围深刻反省的思想家，其中，我认为最深刻的是怀特海。他晚年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来回顾这些伟大思想家以及他自己的反省，收录在题为《思想方式》的小册子里面。根据怀特海的反省，过去两千多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柏拉图式的，是静态的和逻辑的，而不是动态的和历史的。

从几何学发源的西方理论，在这一传统之内能够提出的任何社会理论，其形式都可以还原到《几何原本》。关于这一点，我建议各位参考庞加勒的著作，例如《科学与假设》中译本，

其中有详细论证。如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中指出的,每一套逻辑体系(例如《几何原本》这样的逻辑体系),其逻辑前提总会有一部分是和现实世界相关的,这些相关的部分,在古典逻辑里面称为“非逻辑常量”。通过这些“常量”,逻辑体系与外部世界的特定经验事件有了一一对应的联系。没有这一类“非逻辑常量”的逻辑体系,被金岳霖批评为“空洞的和无着落的抽象体系”。阿罗的逻辑体系的“非逻辑常量”,就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第一章和第六章里面——第六章是1963年补写的。

所谓“规范理论”,技术性的部分是自明的——即逻辑体系之内的各种可演算的命题的推演;不自明的部分最重要,那甚至是根本不能自明的,即基于所谓“根本直觉”而提出来作为公理的部分——没有谁可以澄清为什么阿罗从几乎无数可能的公理中选择了那样几项公理当做他的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

规范理论家的根本直觉,只要被表达出来,就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研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一点,阿罗已经做到了。逻辑可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那些不可能有的关系而不是那些可能有的关系。一切不可能性定理都可以还原为“是A就不可能不是A”这样的命题,这当然是同义反复,因为这是逻辑公理之一。

那么,理论家能够做的事情在现实社会里是怎样的呢?首先,如果你因为不懂得几何学从而无法走进柏拉图学园的话,那么柏拉图学园里的那些理论家能够告诉你:只要有一套基于你的常识就可以说服你的自明的公理——几何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只要你觉得这套公理确实是自明的,那么,几何学家或者社会理论家就能够逻辑地推演出其他一些你不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在理论家看来其实只是同义反复,这就是理论分析能够显示给一般人看的东西,即我上文提到的技术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工作,它们只是给走不进柏拉图学园的那些人看的。对于真正的理论家来说,显示给外行看的这些东西是不很重要的。真正的理论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阿罗做过的工作,理论家之间要讨论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一套公理而不选择那一套公理?在所有可以选择作为逻辑体系的出发点的那些公理当中,选哪些是最合适的——既与经验世界保持合适的相关性又具有逻辑推演的便利性和丰富性。阿罗定理所显示的,就是这样一种选择,他选择的公理既有与经验世界的基于常识就可理解的重要的相关性,又有逻辑推演的便利性和丰富性。他所选择的那些公理之间,在技术上容易显现出它们的不相容性,所谓“不可能性”定理。基于类似的理由,阿罗之后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要么是技术性的——即寻求更具便利性和丰富性的逻辑体系,要么是本质性的——即寻求不同于阿罗体系的与经验世界的更重要的相关性。

以上就是理论家的任务,它们被称为规范的,因为它们不能提出经验世界里现实可行的方

案。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应澄清的就是这一点。

西方的知识只分为三类：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上面介绍的阿罗思路就是理论知识的示范。理论知识的思路不能提供的，是实践知识的思路和历史知识的思路。布坎南的思路是实践知识的一个示范。

诺斯认为，企业家和政治家的社会功能是同一的，就是落实那些在其他人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方案。只有当这些设想被落实之后，它们成为现实之后，才可能有理论家把这些结果概括成为某些逻辑体系的“非逻辑常量”，进而提供解释。

政治经济理论就是观察政治经济的实践活动，然后概括出各种各样相应的逻辑体系，像阿罗那样，从某一逻辑体系之内推演出一些“不可能性”。

新政治经济学的两条互补的思路，我说过，是阿罗的理论工作和布坎南的实证工作。森的工作，我认为是试图对阿罗思路和布坎南思路加以整合，所谓“综合”的思路。这一企图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森的文集《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当中——参阅我为这本文集的中译本撰写的序言。

作为我的这一开场白的结语，让我重复开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研究的是“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我的回答是：因为政治学与经济学各自的内容已经与古典时期很不一样了。新政治经济学更像是结合了马基雅维利之后的新政治学和马歇尔之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不像是新政治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由于这一思想方面的重大差异，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十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似乎只顾及单一目标的极大化问题，故而只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于经济学问题。前者则要研究多重价值的优化组合问题，故而更多地运用代数和拓扑方法于政治经济学问题。

会议信息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



2006年9月23日至24日，中国首届“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来自全国的五十余位学者聚集杭州市灵峰山庄，就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展开深入讨论。

在论坛的开幕式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汪丁丁教授作了“为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报告。汪丁丁教授指出，现代新政治经济学是围绕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的，这两者有两个共同前提：第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第二，以价值（value）取代“口味”（taste），在价值概念基础上界定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新政治经济学更像是结合了马基雅维利之后的新政治学和马歇尔之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不像是新政治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由于这一思想方面的重大差异，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十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似乎只顾及单一目标的极大化问题，前者则要研究多重价值的优化组合问题。在开幕式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张旭昆教授阐述了当前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遇到的障碍和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不应回避中国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应研究政治转型的道路问题。

在论坛的讨论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徐家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

学院管毅平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德翼教授、清华大学路江涌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赵德余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丁利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马永翔博士等学者，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其中，姚洋教授的“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一个演化的视角”、叶航教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问题”、马永翔博士的“从心智秩序到社会秩序”、赵德余博士的“民主集中制下的主流观念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等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教授总结了两天的讨论成果，展望了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并对青年学者寄予厚望。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

——基于工作搜寻理论的一个实证研究

◎ 易君健*

摘 要: 本文在工作搜寻的理论分析框架内, 运用最新获得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以及就业之后的工资水平展开实证分析, 着重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经济行为特征, 特别是流动的时间、费用、渠道与就业工资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基于本文实证分析结论所提的政策建议为: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以及高效合理的人力资本定价和培育机制是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有效流动并重新就业的基础设施和前提条件; 同时帮助滞留在原有经济体制中的贫穷农村劳动力进入新兴的市场体制, 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 流动; 就业; 工作搜寻

一、序 言

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 “三农问题”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难题之一。而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则依赖于目前数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效流动和重新就业。但是统计数据却表明: 农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8.1% 直线下降到 2004 年的 15.2%, 而农村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1978 年 70.5% 下降到 1998 年的 49.8% 之后再无下降趋势, 而且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上升的反常情况。2004 年第 2 季度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那么,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阻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流动? 又是什么因素在决定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之后的工资水平呢? 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

* 易君健,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博士生。通讯地址: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 C301, PGH 1,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PR. China. E-mail: JunJian@cuhk.edu.hk.

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受到经济利益的刺激以寻求更好的工资报酬,所以从本质上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过程就是一个工作搜寻的过程。因此,本文利用最新获得的调查数据,在工作搜寻理论分析框架内从微观层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展开经验分析,着重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行为特征,特别是搜寻费用、时间、渠道与就业工资率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对二元经济体制下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机制展开规范分析。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大中型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核心主题之一。从对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意义以及数量规模的一般描述性阶段进入到对户籍制度(蔡昉,2001),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都阳,2001;赵耀辉,1999,2000),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和职业隔离现象(杨云彦,陈金永,2000;),农村劳动力歧视问题(姚先国,赖普清,2004;王美艳,2003),以及流出劳动力的回流现象(赵耀辉,2003)等各项专题的深入分析。但是,总体说来,目前对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原因以及流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详尽,而对于流动的过程,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渠道、方式和时间方面的分析较为薄弱,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心所在。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工作搜寻理论进行了简略的回顾并建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在本文所运用数据的基础之上对农民工工作搜寻行为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则详细介绍了本文所运用的计量经济模型;第五部分对农民工工作搜寻进行了经验分析并对其回归结果加以讨论;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分析框架

(一) 工作搜寻理论回顾

搜寻理论主要是针对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行为假定条件之下,描述个人如何采用一套理性的决策法则,进而推演出合乎理性逻辑的结果。而应用搜寻理论最为广泛的领域还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分析。自从 Stigler (1961, 1962) 首次对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问题展开分析之后,工作搜寻理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此后,在序贯决策理论的基础之上,MacCall (1965, 1970) 和 Parsons (1973) 开始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行为进行了分析,但是自 Burdett (1978) 之后,工作搜寻理论开始集中于在职搜寻。进入 90 年代以后,Neumann (1997) 和 Mortensen (1999, 2004) 在马尔可夫决策理论的基础之上,开始运用一种随机动态模型对不同时点上劳动者不同的工作状态与劳动力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在放松了信息的完全性假定之后,工作搜寻理论为新古典就业理论提供了新的分

析框架,对劳动力市场微观运行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二) 分析框架

基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与数据限制,我们将中国农民工进城寻找工作视为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分析。考虑到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与城乡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将农民工进城视为初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具备相应的现实基础。

首先,假设某一特定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分布函数是 $F(W)$, $F(W)$ 服从 (μ, σ^2) , 其中 W 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为一随机变量,同时假设每次搜寻行为相互独立,那么工作搜寻的法则如下:

$$\begin{aligned} \text{如果 } W \geq W_0 + T_c \quad & \text{则停止搜寻,接受工作} \\ \text{如果 } W < W_0 + T_c \quad & \text{则继续搜寻} \end{aligned} \quad (1)$$

W_0 表示既有的收入水平, T_c 表示流动成本。

搜寻者根据等边际法则,即搜寻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来决定其最佳搜寻次数,再从中判断是否接受工作。由于每一次的搜寻是相互独立的,故搜寻者每次搜寻的效益净额的期望值为:

$$E(W - W_c | \text{搜到的工薪}) = \int_{W_c}^{\infty} (W - W_c) f(W) dW \quad (2)$$

其中, $W_c = W_0 + T_c$, 表示就业的最低工资,即保留工资。

再假设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则:

$$E(W - W_c | \text{搜到的工薪}) = \sigma^2 f(W_c) + (\mu - W_c) [1 - F(W_c)] \quad (3)$$

但是,所搜寻到的高于保留工资的岗位并不一定有缺额,所以应该将劳动力市场中是否存在空岗的概率放进模型加以考虑。若搜寻时能遇到提供工作缺额的概率为 $g(v)$, 其中 v 表示工作机会,则搜寻的边际收益 (MSB) 为:

$$MSB = g(v) \{ \sigma^2 f(W_c) + (\mu - W_c) [1 - F(W_c)] \} \quad (4)$$

根据搜寻的边际成本递增的原则,假设搜寻成本是搜寻次数 n 的二次函数,即 bn^2 , 并且 $b > 0$, 对 n 一阶求导可以得到边际搜寻成本 $MSC = 2bn$, 根据等边际法则,搜寻者搜寻的最佳搜寻次数的均衡条件是:

$$MSB = MSC \quad (5)$$

由此等式即可解出最佳搜寻次数 n :

$$n = [g(v)/2b] \{ \sigma^2 f(W_c) + (\mu - W_c) [1 - F(W_c)] \} \quad (6)$$

根据前述的搜寻法则可知,当劳动者所寻求的工资至少为既有收入 W_0 与搜寻成本 T_c 之和 W_c 时,搜寻者才愿意接受新的工作。因此根据工资的概率分布,劳动者搜寻一次高于或者等于 W_c 的概率为 $P = g(v)[1 - F(W_c)]$ 。又根据前面每次搜寻行为皆各自独立的假设,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搜寻 n 次才成功的概率 q 为 $n \times P$,所以可以推算出:

$$q = [g(v)^2/2b][1 - F(W_c)]\{\sigma^2 f(W_c) + (\mu - W_c)[1 - F(W_c)]\} \quad (7)$$

再将工作搜寻成功率 q 对就业机会 v 、平均工资 μ 、工资差异 σ^2 、农村劳动力原有的收入水平 W_0 、转移成本 T_c 与搜寻费用 b 求出一阶偏导数,可以得知: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工资差异、搜寻时间与搜寻成功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理,既有的收入水平,搜寻成本与搜寻费用提高时,其搜寻次数相对减少,搜寻成功率随之降低。

三、数据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1—3月以农民工为对象所做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涉及家庭住户399户,劳动力713人,其中在外打工劳动力420人,占58.09%;在家务农的劳动力293人,占41.91%。调查内容包括了家庭情况,劳动力的教育、就业、收入,工作搜寻费用、渠道、时间以及流动意向等方面的情况。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农村劳动力的各项特征,包括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对流动意愿的影响,以及工作搜寻时间、费用和渠道对就业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所以,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在调查中所使用的主要变量以及变量的定义如下。“求职成功与否”被定义为一个二分虚拟变量,如果在我们调查的时候正处于在城市中的就职状况,或者在调查之前的两个月内曾处于城市中的就职状况都称之为求职成功,赋值为1。^①其他情况都赋值为0。“搜寻时间”被定义为一个以天为单位的连续变量,即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一直到在城市中正式上班之间的所有时间,本次调查中,搜寻时间的均值为7.28天。“搜寻费用”被定义为农民在进城寻找工作过程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了车旅费、中介费、餐饮费等各种费用,但是不包括农村劳

^① 因为本次调查的时间正处于2004年春节,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在家务农的农民、外出打工春节没有回家以及春节返回老家的农民工。由于许多农民工在春节回家的时候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或准备来年另找,或准备在家务农,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农民也视为曾在城市中求职成功者。

动力工作搜寻的机会成本。^①而在实际发生的各种搜寻费用中,主要为车旅费。本次调查中,搜寻费用的均值为89.27元。“搜寻渠道”被定义为一定序多分虚拟变量。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你是通过____找到目前的工作岗位?”。针对该问题,我们提供了三个选项:(1)家庭亲戚,同学朋友;(2)本地政府,中介机构;(3)目的地中介机构。其实,在对问题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根据搜寻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定序的。如果选择(1),我们就赋值1,表示搜寻渠道的市场化程度最低;如果选择(3),我们就赋值3,表示市场化程度最高。在本文所调查的420位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当中,选择(1)的有312人,所占比例为74.29%;选择(2)的有78人,占18.57%;其余的选择(3)。

另外,表1描述了农村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间个人、家庭与社会特征之间的比较。从该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与非流动劳动力相比,流动劳动力一般男性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年龄明显低于非流动劳动力。从中可以看出在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之间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心理和生活习惯的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进行流动具有更长的收益期限。其次,不管从正规的教育还是从技术培训的角度来说,流动劳动力一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搜寻更好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收入水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上表中清楚地看出来,流动劳动力的年收入远远高于非流动的劳动力,几乎达2.5倍之多。虽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本差距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农村和城市不同的就业环境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吸引数以亿计的农民向城市进行流动的动力所在。以上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与基本的劳动经济学原理相符,本次调查中的不同之处是对流动者家庭中其他人的年收入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却与基本理论假设相背。一般说来,具有最强烈流动动力的应该是最穷的群体,但是我们却发现流动者家庭具有更高的年收入。

对于迁徙动因的经济学分析开始一般均是基于托达罗(1969)的绝对收入假说。这一假说认为最贫困的群体是具有最强烈迁徙动机的群体。但是这一论断在宏观上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明显不符,因为最为贫困的西部地区显然不是流动数量最大的省份。因此,我们数

^① 刘易斯在对印度农村的观察中得到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里农民的边际生产率几乎等于零。虽然此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对这一论断提出质疑。但是,笔者在这次调查中曾详细地对农民务农的实际收入进行了仔细的计算,在扣除了上缴粮、肥料、农药和水费等必须成本之后(不包括人工成本),一个农民每一亩地利用其劳动所获得的年收入为200元。而在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农村中,人均水田不到一亩地。这样算来,如果不包括其他非农收入的话,中国农民的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的假设基本成立,特别是在农闲的时候。